

高中没毕业,我便辍学在家,因为闲得无聊,就爱上了读书。有时候一天能看几本厚书,开始是读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大概有上千本,后来又读正史、杂史和各种行业历史,大概也有两千本,中外哲学和现当代文学读的更是不计其数……书读得太多,忘性也大。很多读过的书,时隔几年再拿起来重读,竟然没有一点印象!这让我陷入一种尴尬,不知是作者的故事和情节编得不能震撼读者的心灵,还是我先天性脑萎缩。

父亲有不少天南海北的作家朋友,家里不断鸿儒。每来一个作家叔叔,我都很恭敬地告诉对方说:“叔叔,我可是看着您的小说长大啦!”寒暄的话说了,对方的小说也确实读过不少,可我却像是说了瞎话一般,惴惴不安,生怕对方盘问我读的都是什么。好在父亲的朋友都是阅尽世故之人,并不把我的话当回事,或哈哈一笑,或微微颌首,便随父亲进了书房攀谈。

没有记忆的阅读给我造成的不仅仅是尴尬和心虚,还有太多的不便。每每写文章急需借用先哲之言时,我都要到书橱中扒上半天,费时又费工,便会会长叹生出一个好脑袋!虽然嗜书成癖,但脑袋愚钝,读书吸而不记,丢下书本,头脑又回到婴儿混沌未开的状态。

职业读书十几年,也职业忘了十几年,但我还是深深悟出一个道理。读完忘光与完全不读是两个概念。读了虽然没有印象,就像一个人上楼,待上到楼顶后把楼梯拆了,虽然找不到攀上顶层的路迹,但毕竟竟到达了楼顶。所以,不管记忆住不住,读了,总是

有用的。读书讲的是一种情趣,一种爱好,也是一种享受,更是一个审美的过程。不要讲记忆的结果,只要有“学而不已”的精神就行了。想读便读时,读得有滋味。不想读,就把书弃之一旁。若像头悬梁锥刺骨的苏秦,硬把读书当成一种负担和任务,当成博取功名的工具,通宵达旦,熬得头脑发昏,读得枯燥

● 随笔

读与不读

孙歌谣

闹心,学而不化,仍弃之不舍。如此费时熬人,岂胜不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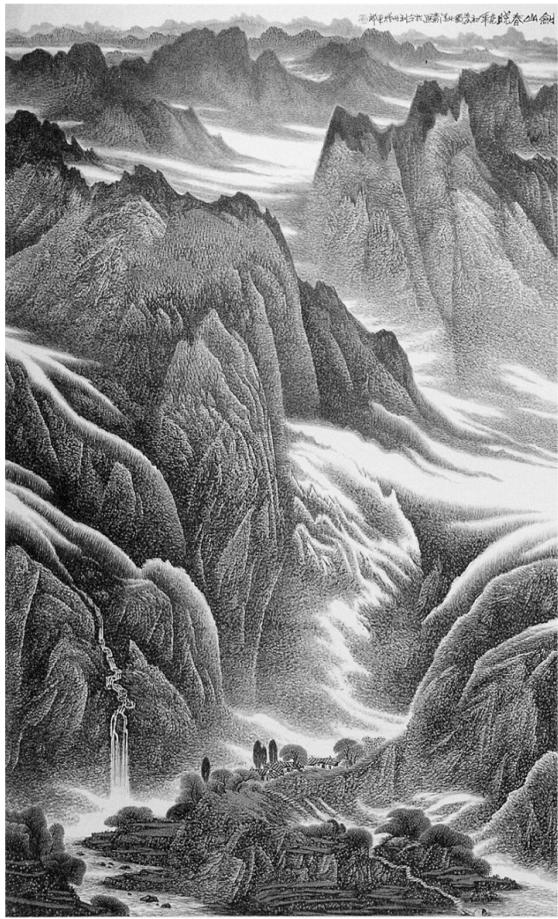
母亲常抱怨我说:“你要是拿读书的劲儿好好上学,早考上大学了!”我说:“不可能!像我这种先天性‘脑萎缩’患者,就是再拿出比这大十倍的劲儿上学,也考不上大学!”上学考验的是强化记忆,殊不知正是这种强化记忆,生生磨损了很多人的读书热情。

常听同学和朋友感叹:“喂,我好久没读过书了!”好久没有读过书的人多如牛毛。尽管我家两个大书房里码满了各类书籍,哥嫂却从来没有碰过。作为一心要书香传家的父亲,常常批判她:“不学无术!”嫂子红着脸略带幽默地反驳父亲说:“爸,现在

早不流行读书了!”嫂子作为人民教师,面对父亲的庭训,嘴上虽然反驳,心里还是惭愧的,所以偶尔也会读一些消闲的杂志。慢慢地,不但她读,还号召她的同事和学生读。

嫂子有一个同事,姓冯,前几年和嫂子一同下乡支教,同室而住。因为我家各类杂志应有尽有,嫂子就会从中挑一些消闲类的刊物拿到学校传阅,分发给那些调皮捣蛋的“学混子”,让他们来曲线求学。因为都是通俗刊物,所以学生看得津津有味,读完了,便开始主动给嫂子要书读。嫂子见状自然高兴不已,朝学校拿书的热情更盛了。见同室的冯老师每天除了教书,就是上网聊天,嫂子便起了改变她的责任心,逼迫着她看书。开初她甚烦,一再拒绝摸书。后来经不住嫂子的好心强迫,便很不情愿地拿来一本。不想刚读几行,便抬头问嫂子:“‘阳春白雪’是啥?”这无知的一问,可让嫂子和另一个同事笑坏了。待嫂子和同事们笑够了,正要给予解释。不想冯老师羞怒地把书一丢,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阳春白雪’,也能教好我的化学!”本来读的不情愿,又经嫂子一笑,以后更不肯再摸书本。事情虽然滑稽,但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听者皆为震惊,无不担忧这种人会不会误子弟?

看来,读了忘光与完全不读,确实是不一样的。与冯老师的自满不同,职业读书十几年,我越学越觉得自己少识寡闻,越学越感叹学海之浩瀚,丝毫不敢怠慢。虽然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几层,但毕竟与地面上的冯老师有了距离。



荆山春晓 李清贵

见到这本书,最先想到的是此前会有一本《袁世凯轶事录》,只是迄今无缘得见。如果真的有,作者大概是同一人。这本《续录》,版权页上署名为“编辑者野史氏”,这个名字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的一个笔名相同,也该是同一人吧。

《袁世凯轶事续录》一书所收第一幅照片,是“小站练兵时之袁世凯”。袁站在高处,位于图片中央,一身戎装,回望镜头。其身旁有人手执旗帜,有人似在

● 文史杂谈

1916年:《袁世凯轶事续录》

张冠生

望远。这一场面,无疑是袁世凯当年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一个瞬间。

百多年后,为做袁家往事的口述实录,曾随一位袁家后贤走到小站练兵之地。眼看满地荒草,石轮横躺,一派沉寂,遥想当年车马辚辚,有时空错位之感。在清军编练现代化拉开序幕的地点,金戈铁马气息连一丝也没有了。如今看见这幅照片,似又稍稍能回过神来。史迹虽已杳然,毕竟上演过“气吞万里如虎”的活剧。

自从知道袁世凯这个名字,听到的,读到的,基本上是个历史的丑角形象。毕竟历史上有段时间,意识形态是扭曲变形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甚至是癫狂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对历史人物有客观评价。后来有个说法,“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回来”,意思是恢复历史原貌。

读读这本《续录》,可知当时对袁世凯并不一味作负面描写。虽首即说其“少时……在金陵,日与无赖少年游,酗酒纵博,意气自豪”,像个小恶霸,次页又

说他在课堂上与塾师为难,其文字也庸劣肤浅,但老师写下“一两三点不成雨,一句而苦无下句时,袁世凯立出‘东南西面皆有风’一句,令‘师为之惊叹不已’。”

野史氏对袁的文字相当留意,收有其“祭李文忠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野史氏说:“项城亲为人祭之。文字殊不雅驯,然项城不肯借他人捉刀,以为非如此不足表敬爱之忱也。”

袁的祭文为四言,说到李的事功,曰“手平匪乱,朽拉枯摧。邻邦握手,敦睦无猜。我公之政,游刃恢恢。我公之德,山岳巍巍。出将入相,相与相和。湘乡并驾,他人难同。天佑我朝,生此巨公。中兴伟业,青史奇功……”

袁世凯当然知道,若找人代笔,会有更好的文字流传后世。但他宁肯“殊不雅驯”,也自己书写。在代笔成风的官场顶层,已算是诚实无欺、值得称道了。

见过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的一幅题词,说的正是袁世凯。“中华民国初建,四方鼎沸,众派纷争,具有统一能力者,中外皆推项城。以其地位、经验与才量,可称为适当人物也。”也见过袁世凯出任任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的一幅题词,赞袁世凯:“进退成规矩,从容若龙虎,其气象足以安民,其精神足以立武。”这一类史料,目前可以越来越多地见到了。一个历史人物,有更多角度和侧面记录,描述其生平、事功的文字,对如实了解、客观评价他,总是有益。

有的人想家是一种成长的习惯;有的人想家是一种对父母无意识的依恋;姥姥的想家则是一种对过去岁月的无限怀念。

● 随笔

想家的姥姥

王萍

姥姥今年八十五岁了,有点老年痴呆,天天总要问几句,家里人知道她在这里么?妈妈总是耐心地对她讲,都知道都知道。其实老家的老房子早就没有人了,舅舅姨姨们早就在各自的城市里工作了,但姥姥的思乡情结却依然如故。

姥姥特别想家,尤其是春节。从三十那一声声热闹,噼里啪啦地鞭炮声中,姥姥知道要过春节了,吵着闹着要回家,舅舅姨姨们的电话虽满天飞,也化不去姥姥对家的思念。她不停地念叨着她的每

个孩子的名字,念叨着家里的每个亲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静夜思》道尽了姥姥的思乡情怀。

如今又到了元宵佳节,姥姥的思乡情更浓了,她常常望着窗外皎洁的明月陷入沉思,我知道姥姥又想家了,想她的父母,想她的孩子们。

姥姥常常跟我念叨她小时候的事,跟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挎着篮

子拾猪草;一起跟妹妹开心地织套子;一起跟小伙伴们在井边玩跨井,回到大家知道后的百般训斥和告诫,姥姥说这些的时候,一脸的向往,好像回到了多年以前快乐的童年。

姥姥常常跟我念叨她幸福的家,从来没跟姥爷拌过嘴,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炮火连天,姥爷在外边为革命而忙碌,她在家种地带孩子,孩子们如何懂事,如何乖巧,如何省心。姥姥絮絮叨叨地说着,一脸的思念,像回到了那个战争迭起,惶恐不安的年代,似又回到了新中国初建,热火朝天的时代。

姥姥啊,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变成时光飞船,载着您回到您几十年前的家,回到您心心念念的家中……

● 新书架

《官居一品》

杨雅丽

小说展现了一个破落书生在跌宕起伏中却依然积极进取的传奇人生。他从一介布衣一步步爬到一品大员的高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尽管说的是明朝的事儿,但他的经历教你如何在复杂的职场中生存,如何赢得与上司的战争。品味官场人生,画眉美人折腰,蘸墨文章风流,谈笑江山似画。

当下官职场小说泛滥,《官居一品》从独特的视角展现一幅明代官职场上的浮世绘。它借古喻今,一方面还原当年明朝风土人情,一方面引喻当下官职场内“潜伏”“沉浮”的现状,道尽小人物所遭遇的悲喜剧。

● 民俗

二月二,剃龙头

常书贞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这天,在我的故乡这一带,无论走到哪一个村子,都会看到许多人在理发馆里排队理发,这就是有着深厚民间根基的“剃龙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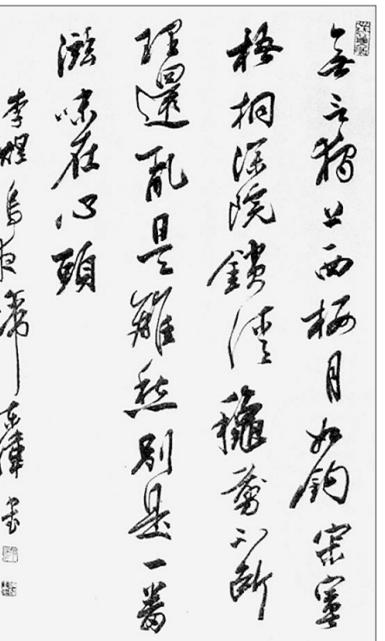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正月里不剃头,剃头死舅舅。”长大以后才知道,其实正月剃头死舅舅是属于误传。不剃头是“思旧”,而不是“死舅”,这是从明末清初开始流传的风俗。因明清两朝发式不同,明末清初,清朝命令所有国民必须剃发。并强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当时有人为怀念明朝,就在正月里不剃发以表示“思旧”,但又不能公开与清朝政府对抗,于是就产生了“正月剃头死舅舅”的说法,并一直流传到现在。乡人们还认为,二月二理发,是

取龙抬头之吉时。这天,儿童理发,叫“剃喜头”,因借了龙抬头之吉时,就会保佑孩童健康成长,长大后出人头地;大人理发,象征辞旧迎新,希望带来好运,新的一年吉星高照,顺顺利利。

记得我小时候,村子里只有一个剃头棚,到二月二这天,一大早里就挤满了人,一天一天还十分冷清的棚子,一下子变得火爆热闹起来。在通往剃头棚的路上,人们络绎不绝,长发遮耳地进去,明明光光的出来,见面时都会互相祝福:“剃龙头哪,交好运哇!”好逗乐子的年轻人见了小孩儿剃了光头出来,还会在人家家门上弹一个响崩儿:“吃了这一崩儿,龙头响铮铮,今年交好运,考个大学进北京!”我家兄弟五个,虽说那

时剃个头才5分钱,但为了节约,也免得到剃头棚耗时间,母亲便用做衣服的剪刀给我们哥儿五个剪头发,剪的效果显然没有剃头匠剃得好,长一下短一下的,被同学们笑话。后来家里的日子稍微好些了,我们哥儿五个也都大了些,多少也要些面子了,父亲便买了把剃刀,起初,手生的父亲虽然会在我们头上剃出血道子来,但我们慑于父亲的威严,都忍着不敢吭声,因为父亲说过:“剃龙头时是不许吭声的。”

年年过二月二,年年剃龙头。现在,不要说城市,就连小村小庄,剃头棚早已被美发馆取代,剃龙头再也不是只剃一个光头的样式了,各种发式应有尽有。这充满朝气的各款“龙头”,让二月二显得更加生动,让日子变得更加美好!



陈伟书法

“布雷先生不为己谋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但是必要时要是要竟要争呀!”蒋介石笑笑,继续说道:“夏天,希望你再跟我去北平视察党务,我将与阎锡山、张学良共商军政要计。”

“是否有什么文字要我代撰?”陈布雷问。“没有什么重大文件,我想请你拟一个对新闻界谈话,还有欢迎新闻记者团新闻稿。布雷先生,前次去北平,你为我写《祭告总理文》,文情并茂,特别是后面一段话:‘今当建国伊始,而总理已长辞人世,不复能躬亲指导。千钧之责任,寄予后死之同志,唯有戮力同心,勉为绍继。以总理之精神,团结本党之思想;以总理之思想,统一全国之思想。革命之基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许身家国,久已矢之死靡他之决心。初不意百战余生,尚能留此微躯……’”蒋介石背诵了一段,接着说:“布雷先生,我是很想请你来中央工作的。”

陈布雷在6月跟着蒋介石到了北平,住了半月,遍游名胜。因为这次任务轻,他感到比较轻松。自北平南返过南京时,蒋介石说:“张静江先生向中央提请以布雷先生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你意下如何?”

陈布雷感到很突然,说:“蒋先生,我不谙教育,且愿在新闻界久于其业。自信以过去之成就,若继续努力,可为本党培养一点宣传力量,较之从政,功效必远过之。”

“那我再向中政会提一提,看怎么样?”蒋介石向中政会提出了陈布雷的辞意,但不准许,陈布雷只好回到上海,准备赖着不去。

有一天,张静江的汽车开到了陈布雷的家门口,四个人把张抬了出来,陈布雷有点惊慌。张静江说:“布雷,你愿不愿跟我到浙江省去当教育厅长?”

“人杰先生,不是我不去,实在是我不懂教育,不愿从政。”

“好,以后再谈。”张静江被人抬走了。但过了一天,他又来了,仍然是四个人抬着进来的。张静江说:“痲疾之身,两次相访,难道你还不愿意屈就吗?”

陈布雷有点感到对不住这位“党国元老”了。张静江又继续说:“蒋梦麟先生调任教育部长,浙江大学之教育行政事务归还省府,我与

连载

但是,日本人做贼心虚,规定“祝捷”大会只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一概不准入内。兄弟俩华军总司令白川大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二十余名高级官员也在这台上依次入座。

约在11时40分,日军头目演说完毕,全场齐唱日本国歌。就在侵略者们忘乎所以之时,尹奉吉走到主席台前装着倒开水的样子,把水瓶里定时炸弹的开关扭开,随即悄悄地离开会场。金天山、安昌杰遥看尹奉吉已经得手,也迅即离开会场。

两分钟后,讲台突然迸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着这声巨响,讲台崩塌,血肉横飞,白川大将被炸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手下人立刻把他送到医院,但他被炸得太狠了,尽管医生们千方百计,还是未能挽救他的性命。第四天,白川也带着万分的痛苦与无奈,死在了医院里。

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日本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男被炸下讲台七窍出血而亡。其他十几个日本人死的死、伤的伤。当时,台上、台下哭声、惊叫声响成一片,白川的“祝捷”大会成了哭丧大会。消息传来,大快人心,上海人民奔走相告,中国人民奔走相告。

炸死了日军侵华总司令白川被杀,犹如一场地震,撼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上讨论东亚问题的政治家们也受到强烈刺激。

白川被杀,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和关切。他觉得能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决非一般,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可除去呢?蒋介石立刻命戴笠,查询这次谋杀案系何人所为。

戴笠经过一番调查,确认此案系王亚樵所为。“王亚樵?”蒋介石迟疑了一下,“真的是他,你有没有搞错?”

“报告校长,我已经亲自调查过,的确是王亚樵干的。”蒋介石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以前向我推荐过他,我没愿用他,看来,是一个失策,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蒋介石想,要是有了王亚樵,那些与自己作对的人,就会被一个一个人干掉。

上午8时,二十四岁的尹奉吉身穿和服,提着有炸弹的大热水瓶,携方便饭盒,同安昌杰、金天山一道,挤在日侨中昂首走进会场。安、金二人进场后即在左右两侧的最后一排坐下,以便策应。尹奉吉则大摇大摆地各处观看,等到11时左右才挤到预先选定的位置,带着热水瓶径直走到讲台前面,顺

手把热水瓶放在讲台下面,返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过了不久,会场里已陆陆续续地坐满了人。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白川大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二十余名高级官员也在这台上依次入座。